

经验、技术与权力： 晋中新区土地改革研究

(1948-1950)

郝正春 著



Experience, Technology and Power:
A Research on the Land Reform in the Newly Liberated
Central Area of Shanx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验、技术与权力： 晋中新区土地改革研究

(1948-1950)

郝正春 著

Experience, Technology and Power:
A Research on the Land Reform in the Newly Liberated
Central Area of Shanx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土地改革研究（1948—1950） / 郝正春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269 - 0

I. ①经… II. ①郝… III. ①土地改革—研究—晋中市—1948~1950 IV. ①D651.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741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3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391 千字

定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土地改革前晋中新区的社会生态	27
第一节 传统乡村社会的经济关系	27
第二节 阎锡山时期的“土地村公有”与“兵农合一”	37
第三节 阎锡山时期的“自白转生”与“三自传训”	43
第四节 “兵农合一”典型村之社会生态考察	48
第二章 晋中新区土地改革政策的生成与发展	65
第一节 老区与新区土地改革之政策经验	66
第二节 晋中新区的调查研究与政策实验	79
第三节 晋中新区土地改革政策的调适与发展	95
第三章 晋中新区土地改革中的民众动员	103
第一节 土地改革初期各阶层民众的思想动态	104
第二节 民众动员的政策依据	114
第三节 民众动员的技术运作	119
第四章 晋中新区土地改革中的权力机构	148
第一节 昙花一现的贫农团	148
第二节 土地改革的执行机构：农民协会	163
第五章 晋中新区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划分	178
第一节 阶级划分的标准	179

第二节 阶级划分的技术运作·····	196
第三节 权力与权威的展示：斗地主·····	205
第六章 晋中新区土地改革中的财富再分配·····	222
第一节 土地分配的政策与策略·····	223
第二节 土地分配之运作过程·····	235
第三节 土地之外的财富再分配·····	255
第七章 晋中新区土地改革中的干部群体·····	280
第一节 土地改革中干部的动员与配置·····	281
第二节 土地改革中干部的训练与学习·····	296
第三节 土地改革中干部的纪律约束与行为困境·····	318
结语·····	337
参考文献·····	346
后记·····	365

绪 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因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土地、农民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大多数农民维持生存和积累的基础，故自古以来，解决土地问题亦为解决农民问题的焦点。时至今日，土地问题仍是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因此，土地问题是存在中国的一大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历代改革的核心无非是围绕着土地制度做文章。自古代的“井田制”后，多数朝代曾实行过“均田”或类似的土地制度。其间也有多次农民运动提出过土地的要求，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古以来政权的斗争与土地的斗争连在了一起。任何政权如果妄图要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那就等于挖掉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诚然，历代当权者都曾试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然直到近代以前，“耕者有其田”也仅仅是中国农民望眼欲穿的企盼而已。后来虽然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然这一被看作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真正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把革命的触角伸向偏远农村之时，便注定了其革命实践必然与中国的土地与农民发生特殊的关联。因而，很长时间内，土地改革就是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土地改革是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之革命步骤。因此，土地改革的历史虽渐行渐远，但并不可断然视其为“历史的陈迹”，从而忽略了其对后来的农村改造以至农村改革的影响和作用，否则将会远离中国的现实。也正因此，有关土改的研究成为学界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乡村社会所必然关注的亮点。

一 土地改革史研究的趋向与思考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有关土地改革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对于不同时期土地改革研究进行学术回顾与总结的成果也是接连不断，这种状况反

映了学界对于土地改革研究的总结与反思之自觉性日渐增强^①，同时亦极大地推动了土地改革研究的纵深发展。就笔者所见，目前土地改革研究最鲜明的特点便是多学科研究方法 with 理论的融合与实践，乃至使整个土地改革研究日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世界史学研究领域，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促进史学理念的更新，是法国年鉴学派在推进西方史学变革过程中极力推崇的研究思路。早在1929年，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号卷首寄语中指出：“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史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呼吁各行的“研究家”，在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的同时，“如果他们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②。两位史家要求“撤掉所有的樊篱和标记”，改变各学科专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以历史学为核心整合其他学科，以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建构历史学，从时空上拓宽历史学的视野^③。也正是这种全新的理念造就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学研究中的地位。而这种理念也深深影响并激励着后来的历史研究者。

就中国本土土改研究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呈现出一个从埋头在“自己的庭院”里辛勤劳动到关注并吸纳“邻居的工作”的一个艰难却又是自觉的转身过程。

（一）“自己的庭院”里的劳动

对于土改史研究而言，历史学以其注重实证的学术理念当仁不让地占

^① 笔者所见难免挂一漏万，兹列举如下：郑有贵等：《土地改革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张佩国：《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张学强：《1979年以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叶明勇：《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08年第5期；张一平：《三十年来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 [日]井上幸治：《年鉴学派成立的基础——昂立·贝尔在法国史学中的地位》，《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③ 江华：《论年鉴学派的跨学科与总体史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

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对于原本属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范畴的土改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本过程及经验的关注,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土改运动。这方面的专著很多,如张永泉、董志凯、孔永松、赵效民、何东、郭德宏、成汉昌、杜润生、罗平汉等均著书从宏观层面就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土改之整体历程、政策得失、经验教训等进行了详备的历史实证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参照^①。此外,史料的整理与发掘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研究机构收集整理了大量档案、报刊和回忆录等资料^②,为土改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相较专著和资料而言,更多的是关于土改实证研究的论文。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土改运动的政策分析、土改运动进程的总体性描述、土改中的偏差与失误、土改的意义与影响等。

土改政策是土地改革的合法依据,一直是土改研究的重要内容。《五四指示》是解放战争初期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学者们一方面一致肯定《五四指示》的历史作用,认为它标志着中共抗日战争以来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另一方面,又普遍认为,《五四指示》存在着不彻底性。代表性论文有管春林等的《如何认识〈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③、杜敬的《关于“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几个问题》^④、罗平汉的《〈五四指示〉及其“不彻底性”再评价》^⑤等。平分土地被视为是实现

① 张永泉、赵泉均:《中国土地改革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何东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成汉昌:《20世纪前半期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罗平汉:《土地改革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土地改革》,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新区土地改革》,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④ 《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⑤ 《求索》2005年第5期。

“耕者有其田”的主要方案。杜敬的《土地改革中没收和分配土地问题》^①和《再谈“平分土地”》^②、王钦民的《解放战争时期平分土地政策剖析》^③、陈文桂的《“平分土地”再分析》^④、梁福的《解放战争时期平分土地政策新探》^⑤等就土改中土地分配政策做了细致剖析。学者们对平分土地的政策持基本肯定者多，但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都不赞成绝对平分、绝对拉平，如果绝对平分必然会侵犯中农利益，从而影响土改的效果。此外，莫宏伟、白纯、钟霞、谭志云等对土改中的阶级划分政策、富农政策、公地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特殊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⑥。

土改政策的出炉及具体实践与中共高层领导的谋划与参与密不可分。莫宏伟的《饶漱石与华东新区土地改革》^⑦、秦宏毅的《浅论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⑧、张根福等的《试述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的土地改革思想》^⑨等对部分中共领导人的土改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研究。

关于土改的整体性描述有助于读者对土改历程的全面了解。徐少岩的《解放战争时期南宫县的土改复查和参军支前工作》^⑩、石雅贞的《东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⑪、张占斌的《东北土地改革的序幕》^⑫、王少钰的《河南省土改运动浅析》^⑬、任涛的《略述豫西解放区的土改运动》^⑭、徐

① 《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② 《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6期。

③ 《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④ 《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4期。

⑤ 《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

⑥ 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中共对富农问题的探索及其教训》，《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4期；白纯：《苏南土改中的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钟霞：《苏南土改中的农村公地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谭志云：《苏南土改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⑦ 《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⑧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⑨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⑩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⑪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⑫ 《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5期。

⑬ 《河南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⑭ 《河南党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则浩的《五河县上殿集村土地改革综述》^①、朱玉湘的《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②、刘洁和衣保中的《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土地关系的建立》^③、苏俊才的《闽西土地改革运动述评》^④等，就不同地域土改的整体状况作了分析描述。

由于种种原因，土改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与失误。王钦民的《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纠正》^⑤、韩志宇的《“平分土地”政策中的偏差与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⑥、王淑辉的《解放战争时期南阳地区的“急性土改”》^⑦、牛崇辉的《论晋绥土改运动中的极左倾向》^⑧、罗平汉的《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及其纠正》^⑨、张成洁的《苏南土地改革时期斗、打偏激现象的历史考察》^⑩等论文对土改中出现的偏差与失误进行了客观描述和讨论分析，这些研究均是学者站在理性的角度对土改的一种反思。

土改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是空前的。周约三的《土地改革对消灭封建关系及发展生产力的意义》^⑪、郑志廷的《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历史作用新探》^⑫、范守信的《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和党的互助合作政策》^⑬、冯开文的《从土地改革转入农业合作化的制度变迁机理分析》^⑭、何健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社会大变革》^⑮、秦立海的《试论解放区土地改革所引起的农村社会变革》^⑯、汪志强的《新中国土地改革对构建政治新秩序的影响》^⑰等分析了土改对农村社会之直接或间接

① 《安徽史学》1989年第4期。

② 《文史哲》1990年第2期。

③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④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⑤ 《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3期。

⑥ 《党史文汇》1987年第2期。

⑦ 《河南党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⑧ 《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

⑨ 《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⑩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⑪ 《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

⑫ 《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⑬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

⑭ 《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

⑮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4期。

⑯ 《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⑰ 《长江论坛》2004年第6期。

的影响。

综观上述研究，可谓成果丰富，但大都难以突破革命史叙事的框架。总的看，政策研究多，实践研究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政治、经济影响研究多，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影响研究少。大都限于“政策一效应”的范畴，强调的是土改的合法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同时肯定土改对革命战争、乡村发展及农民自身解放的积极作用，对土改运动中的一些消极面则往往概括为政策失误或执行错误，因而所见的研究成果面貌单一，缺乏生动表情。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史学研究中风行以论代史的做法，用概念给历史穿靴戴帽，不能走出宏大的叙事语境，动辄是历史的必然性如何如何，忽视历史细节的探幽发微。直到现在，在许多著述中还存在着这种僵硬的唯物史观言说范式。”^①这种趋向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表现更为典型。“如党的领导，对群众的发动，我们一般只是写党提出了什么思想，召开了什么会议，制定了什么方针政策，发出了什么号召，至于如何具体地进行领导，如何具体地发动群众，群众有什么态度和反映，就没有了，好像号召一发出，方针政策一制定，领导工作就完成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通篇都是‘文山会海’”^②。的确，在传统革命史叙事的逻辑中，“过程—事件”被忽视或抛弃了。

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史的复兴，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学者们亦极力呼吁把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引入党史和革命史研究。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在1993年的一次报告中指出：以前对革命史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研究是互相脱节的，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不注意吸取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以致难以对中国革命作出完整、深刻的解释。因此，他强调应该从社会史的角度加强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早在20世纪70年代讨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就曾萌芽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即认为只有把党内领导层的斗争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明白什么是

^① 王海光：《他山之石的启示：关于中国治史理路的再认识——兼评麦克法夸尔的铁三角理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

^② 郭德宏：《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中国革命”^①。在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张静如等学者也先后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②。由此可见，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强调与社会史的结合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趋势，这与一些学者的呼吁和推动密切相关。其后，革命史研究者们走出“自己的庭院”去关注“邻居的工作”渐渐成为一种历史的自觉。

（二）“邻居的工作”：多学科对话

“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③。近年来土改研究就基于这样一种取向，不再仅关注宏大的事件评述，而是在历史学的基础上汲取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自下而上”、“由小而大”的考察研究。其成果亦日渐增多，且在多学科对话情景下，这类研究很难按学科分类有明晰的区分，必然的趋势亦是谁也离不开彼此。

特定区域的土改研究成为多学科对话图景中最为鲜亮的一景。秦晖的《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对土改的前提即地权集中的观点提出了“关中无地主”、关中有封建的新论点^④，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王友明和张学强均就山东莒南土改进行了研究^⑤，前者着重于述析新中国成立前老区土改中的减租减息、土改、反特复查、地权变动及民众动员；后者则是基于口述资料的一种土改叙事。张鸣的《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对中共在华北土改中的动员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注意到日常伦理与运动伦理之间的矛盾，颇有启发意义^⑥。张佩国的《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从农民日常生活的话语与道德逻辑来认识土改实践，认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组成了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制度，在正式的制度安

① 饶伟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② 张静如：《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4页。

④ 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 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⑥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

排向乡村的地方性知识渗透过程中,官方文本中‘革命’的意义已逐渐让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①莫宏伟和张一平有关苏南土改的两项研究是认识新中国成立后苏南农村社会的典型。前者论述了苏南土改基本过程及对地主的斗争、郊区土改、土改中的工商业、富农经济、重大偏差、土改后的苏南农村等,其内容涉及苏南土改的多个方面。后者则是围绕苏南土改前后地权形态的变化及政权建设中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展开的^②。总之,土改的区域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对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借鉴也产生了许多独特的研究成果。如李里峰的《“运动”中的理性人》^③、《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④、《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⑤、《土改政党中的精英监控与乡村治理》^⑥,张凯峰的《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村政权》^⑦,满永的《土地改革与建国初乡村政权的合法化建构》^⑧,马润凡的《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⑨等,就中共在土改中如何构建国家政权模式进行了分析。此外,李里峰的《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⑩、邢乐勤的《论土改后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⑪、王瑞芳的《土改后的中国富农:从保存、限制到消灭》^⑫和《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⑬等,对土改时期的各社会阶层的命运进行了讨论分析。张小军的《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和象征资本》^⑭在研究福建阳村土改时,则运用“象征资本”的理论把焦点聚集于阶级划分中的象征资

①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4月号。

② 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1949—1952)》,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

③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④ 《福建论坛》2007年第11期。

⑤ 《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⑥ 周晓虹、谢曙光主编:《中国研究》2005年秋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⑦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9月号。

⑧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4月号。

⑨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

⑩ 《福建论坛》2006年第9期。

⑪ 《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⑫ 《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⑬ 《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

⑭ 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本生产。

周批改的《土改后农村的社会分层与税收政策》^①、李里峰的《经纪模式的消解：土地改革与赋税征收》^②、李炜光的《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③、董国礼的《土地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效应》^④、莫宏伟的《土地改革后苏南土地交换、租佃和买卖的历史考察》^⑤等，就土改期间的经济政策及经济变化进行了剖析。此外，一些学者借鉴现代化理论范式对土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如余君的《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发展》^⑥和《土地改革的现代化透视》^⑦、江红英的《试析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及道路选择》^⑧和《新区土地改革与开辟工业化道路》^⑨等。

心态史学是目前历史研究中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心态史学”作为历史学与心理学合作而开拓出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⑩，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归纳起来讲，心态史就是通过发掘人口统计、日记、报纸杂志、档案、遗嘱、田契、诉讼记录等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原始材料，借用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探索人类过去下层民众群体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把历史的探寻点转到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通过分析广大民众一些明了、清晰的言语、心态、传统、情感、智慧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通过分析前人群体几乎不知不觉接受的、世代沿袭的观念和意识来说明历史问题^⑪。心态史学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年鉴学派史家认为，“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构成历史最一般的基础，从这里才能把握到历史的总体和本质，才能对历史

① 《广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③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

④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⑤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⑥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5期。

⑦ 《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11期。

⑧ 《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⑨ 《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⑩ 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⑪ 程利、王晓丹：《略论心态史与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①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甚至干脆说：“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②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其所包含的内容还是所具有方法论意义来说，心态史学都极大地启发了研究者所关注的观点和研究思路。近年来，一些学者已受其影响把研究视角伸入到土改对民众的社会心理的影响，及由此引发的行为方式的变化。如莫宏伟的《新区土地改革时期农村各阶层思想动态述析——以湖南、苏南为例》^③ 和《苏南土地改革后农村各阶层思想动态述析（1950—1952）》^④、李金铨的《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⑤、王欢的《土地、政策与农民心态》^⑥、王瑞芳的《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以建国初期的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⑦、王仕忠的《土改时期沂水县妇女社会心理与行为变化》^⑧、崔晓麟的《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⑨、刘玲的《建国前土地改革中乡村社会农民心态态势探究》^⑩、李立志的《土地改革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⑪、郭于华和孙立平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⑫、吴毅和吴帆的《传统的翻转与再翻转——新区土改中农民土地心态的建构与历史逻辑》^⑬ 等论文对农民面对土改时的漠然、怀疑、抗拒、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等在中共的动员下如何转变为思想觉悟的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增强，进而迸发出惊人的政治能量的心理历程进行了描述，从而再现了身处土改经历中的各阶层的心路历程。

① 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页。

② [英] 彼得·伯克著，姚朋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③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④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2期。

⑤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⑥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⑦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⑧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⑨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⑩ 《求索》2007年第11期。

⑪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⑫ 杨念群等编著：《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⑬ 《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

勒高夫在论述“今天的新史学”中提到,历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他提出“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①。人类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已经为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帝王将相史,而扩展到对地方性历史的关注,对日常生活史以及边缘民众史的关注等。特别有助于历史研究者形成“自下而上”的微观史观,并在“田野”中获取灵感。张佩国在《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②中曾指出,中国乡村革命的研究中存在着诸多的叙事困境,如“革命”与“现代化”叙事的两难,革命叙事中的官方表达与实施逻辑的背离,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国家权力与村落社会的二元解释,等等。突破这些困境所采取的研究策略,应是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去观察、理解农民行为的社会历史空间。指出“如果更多地采用社会人类学的‘在地’式观察视角,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来认识‘土改’发生的社会历史空间,可能会更为全面地再现‘土改’的实践构造。”近年来借鉴人类学方法进行土改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突出。方惠蓉的《“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③以口述资料和文本分析为基础来探求乡村民众是如何去思考他们周围的世界和阐释自己的生活的。岳谦厚等的《“郭四颗事件”与“反封先锋”的构建》亦结合了许多事件关系人的回忆,对中共晋绥边区汾西县霍家坪土改过程中贫农郭四颗被“迫害”致死一案进行了描述和研究,从而如讲述一个乡村故事般呈现出事件的复杂性^④。

如果把中国学者的研究当作“自己的庭院”的工作的话,国外学者的土改研究可谓“邻居的工作”。同样,越过“自己的庭院”的围墙关注一下“邻居的工作”会领略到另一番风景的别致,或者说他们在运用多

① [法] 雅克·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② 《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

③ 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585页。

④ [美] 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7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学科研究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方面均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对中国土改给予最早关注的海外学者是韩丁、柯鲁克夫妇等，他们通过记述亲身见闻，探讨了土改与中国共产党如何赢得农民、奠定革命胜利基础之间的关系，并对土改给予高度评价。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是他1948年春天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山西潞城县张庄村的土改复查运动，并借此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①。《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是柯鲁克夫妇1948年春天进入河北十里店村参加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真实记录^②。可以说这两部作品对于土改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引领作用，也可以说是微观研究的很好典范。也有学者对韩丁与柯鲁克夫妇笔下的土改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对土改蓝图的理想化表述，现实却与它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弗里曼等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篇论著里，作者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田野调查为中心，探讨了包括土改在内不同时期中共的改革对农村社会及农民的影响、对国家的建设作用等，认为“土地改革及其后的集体化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民以权利”，而是使“最具报复心理的人变成村里新的掌权者”，且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泛滥成灾。^③《中国震撼世界》中记述了杰克·贝尔登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亲历了华北解放区的土改的情形，作者对中共“过问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作了片段描述，并认为中国革命加强了权力^④。另外，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⑤、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等也都有涉及土改的内容。珀金斯认为“租佃的普遍存在并不构成增加土地产量的主要障碍”，“土地的再分

① [美] 韩丁著，韩惊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加] 伊莎贝尔·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著，安强、高建译：《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③ [美] 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

④ [美] 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⑤ [美] 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